

把握数字经济的“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

□ 徐浩然

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将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

高创新性: 激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生机活力

所谓“高”，主要是在数字经济的赛道上，技术与组织的创新会触发“连锁反应”，某项成功的创新后面紧接着会引出几个甚至几百个迭代升级的创新。创新是人类文明的特质，也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今天的数字技术已经具备把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的能力，整个社会的知识资产不再只是学术成果，而是可以经由比特化、代码化、软件化转变为便于操作实用的模型，从而为人们的生活赋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科技创新是推动生产力大幅跃迁的杠杆支点，科技创新发展到什么水平，生产力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关联关系就会发生与之相应的变化。以大数据技术为例，它让我们更加精准完整地把握运动变化的世界，一个大规模应用数据、组织生产和共享经济的时代正在冉冉趋跃、倍道而进。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数据的价值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不同于物质性的东西，数据价值不会随着时间的斗转星移而消逝，反而能够不断被处理并挖掘出潜在价值。当初始数据的用途完成后，其潜在价值暂且处于休眠状态，直到被二次利用又会继续释放强大的能量。从近些年美妆、电子、电器、服饰等行业领域的成功案例看，一些企业选择数字原生的方法论重新建构供应链、销售、研发的布局，创新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关键就是基于专属场景、运用大数据技术敏锐抓取市场需求，及时更新产品概念并进行仿真实验。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内在要素，直接影响着生产力的其他要素。

从历次科技革命的结果看，新生产要素的涌现能提高传统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效率，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推陈出新、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在数字时代，数据不但成

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还是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合力、提炼成效率的催化剂。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中国正在努力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随着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与日俱进，数据信息的相关服务，如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等随之蓬勃发展，数据生产成本大幅降低。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分析，由于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生产者能够以更低的价格供给产品，消费者因满意度增加更愿以较高价格购买产品，这便提升了社会总效益。在数字经济时代，大部分商业往来都是基于对深度需求的洞察，这反向推动了企业加速升级品牌、商品、策划、设计、开发、制造、渠道、零售服务等主要板块。在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更容易形成1+1>2的系统效果，正如21世纪以来大数据技术驱动，人类社会能突破资源瓶颈创造出发达的生产力。

强渗透性: 扩展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增长空间

所谓“强”，说的是数字技术能够广泛渗透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赋能和扩展现代经济的增长空间。比如在工业生产中，数字技术能完善车间的信息过程，通过数据采集可以全方位深入了解劳动对象的可塑性，然后提升工业机器人、流水线设计与所形成器物的匹配度。又如交换过程，现在有很多诸如直播、VA/AR、到家业务等新的方式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出来，人、货、场线上线下全网多渠道融合的结构模式愈加成熟，买卖逐渐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且能够做到端到端的全链路高效、精准的匹配。再如在消费领域，供给方运用大数据技术设计、研发消费者切实需要的、适销对路的好产品，消费体验越来越好。以消费者为核心、以大数据技术驱动、以智慧品牌引领、以快速柔性供应链为支撑，一种新的商业文明正在数字经济中崛起。

数字技术正在将现代化经济体系塑造成一个系统整体，这一复杂系统工程的基础层是新型基础设施，再上一层是各种平台，而平台之上是大大小小的市场主体和消费群体，数据生产要素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譬如在“购物节”的场景内，为什

么有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在某时段内能够同时进行海量的交易？因为以前的交易过程都是链式的，从生产商到零售商，以及众多的中间商都是串行处理，反馈回路过长，抑制了效率；而在消费互联网时代中间商没了，交易的平均路径长度变短，同时又出现许多新的服务商来维护平台交易，这是一张能够并行处理的多边网络。数字技术的应用提升了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效率。当数字经济繁荣发展起来，人们进行较少的要素投入就能获得更优质、更高效的产出，从而实现创新、协调、共享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当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当数字技术嵌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就意味着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数据+算力+算法”的新世界。从零部件到生产线，从建筑物到城市群，从材料科学到生命科学，各个领域都在尝试建构一个数字孪生体、并且大有“六合统一”的趋势。面向未来，物理空间中具象化的要素、实体、活动与数字空间实时交互、高效协同，虚拟映射、人机结合将促进系统内资源配置和治理的按需响应、及时迭代和持续优化。譬如，智能装备和软件能提高劳动效率，“数据+算法”可以对物理世界进行状态描述、原因分析、结果预测和科学决策。运用数字技术，所有产品都有了数字生命周期并最终实现对物理世界中产品的改造升级，人们将正确的数据在恰当的时间传递给合适的人和机器，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流，优化资源的配置效率。

广覆盖性: 释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网络协同效应

所谓“广”，说的是数字技术能推动社会化大生产实现网络化协作，生产要素投入的种类、数量以及要素组合方式在网络上会产生“化学反应”，从而让科技创新对生产力的进步产生“幂数效应”。在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化是人类社会关系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随着互联网的嵌入，我们每一个人都好比“小世界”网络上的一个节点，数量巨大的不同节点在网络上持续交互作用，网络演化形成了非线性动力学机制。目前，经由通信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能初步感受到从通信设施到软件应用这一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幂数效应。

特别是随着5G网络铺设，云计算正在成熟、人工智能迅速发展。5G网络的高可靠、低时延和大带宽的特性同To B（企业）或者说生产端的相关度更高，沿着To B方向、智能制造是大势所趋。在数字时代，经济活动丰富多彩，互动经济由各种事件交织的网络结构，变量不断增加且相互之间作用日益增强，推动生产力发展呈指数级增长。

今天，社会化大生产的网络协同水平无论在规模还是深度上都超越了以往任何时候。譬如在工业互联网场景下，我们看到今天的生产组织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参与主体的多样性和小型化，生产效率的影响因子由内及外且富于变化，技术创新带来诸多不确定性，生产体系的流动性和非平衡态。可以说社会化大生产是在更多与外部资源高效链接和协同中进行的，在持续变化的环境下，无论是生产本身、还是与外部的关联，都需要适时动态调整各个单元之间的协同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生产经营组织必须紧跟环境变化调整模式，这样在新经济中才能塑造较为优越的管理形态，以适应信息化的全球经济。数字经济中的网络协同结构是动态开放的，而且可以无限扩展、变易并集成新的节点，高水平的网络协同是对更有效的生产、更大的市场以及更快流动的回应。

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进一步融合，社会化大生产的网络化、规模化水平越来越高，协同共生促进了各种关系和联系的生成，而当所有事物互联互通之后网络又会向更高层级演化。可以说，“无界”是数字技术广覆盖后的最直接影响。就像前述提到的生产消费关系，网络协同效应不断瓦解产品生产者和服务消费者之间的旧式关系，生产者在消费，消费者也在生产。过去大规模的定制，前提是消费意向单一；而今天数字技术能够面向更细分的群体设定产品规格，客户让企业知道如何精准匹配需求，企业与客户之间形成了一种更为及时完整的反馈回路。在数字经济条件下，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开放、合作、共享为特征，生产系统越封闭，则生产能力越滞后。因此，每个企业都必须着眼开放系统，拓展共生空间；要围绕满足用户需求的目的，淡化组织内部各个单元之间以及组织同市场之间的边界，将各种生产要素有机组合在一起。

（上接1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提出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任务。为此，党中央专门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做出有关文化建设与发展的一系列规划。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挥着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展形象的作用。

正确处理一元主导与多样化发展的关系，既保证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又不断促进文化的繁荣兴盛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科学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包括指导文化改造与重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阶级斗争为核心，高扬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旗帜，弘扬为党为革命忠诚不渝、百折不挠、勇于牺牲的精神境界或道德理念，构成革命文化的主旋律。与此同时，提出建立文化界统一战线的任务，要求无产阶级文化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新文化、民族传统文化求同存异，并在合作中进行引导。新中国成立后，在进一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全国文化建设与发展中的指导地位的同时，在大力倡导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大力倡导和支持颂扬革命颂扬新国家新社会、自觉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文化创作和科学研究的同时，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力求实现既有统一意志、又有独特创造和个人风格的生动活泼的文化局面。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重倡“双百”方针，要求发扬学术艺术民主，同时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保证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正确方向。及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党中央又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方针。“弘扬主旋律”就是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等；“提倡多样化”，就是承认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只要是能够使人民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的精神产品，都应受到欢迎和鼓励。

针对文化走向发展繁荣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鲜明回答。首先，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其次，强调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文化之魂。概言之，就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关系文化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关系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并将其列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的首要内容。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主导，不成方圆；没有多元，缺乏活力，一个有主导又多元化的“文化雁阵”是较为理想也是可以形成的格局。

正确看待和处理古今中外文化之间的关系，努力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形成了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的鲜明立场，概言之，对于中国“固有文化”要批判地继承，吸收其革命性民主性科学性精华，剔除其封建的迷信的尤其是禁锢人的思想与精神的糟粕；对于外来文化要充分吸收其“优良成果”，但“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而是“大胆的与批判的接受”。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时期形成的对待古今中西文化的态度基本延续下来，1964年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采用、吸收世界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党中央领导人明确指出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并倡导以客观科学的态度，还文化遗产特定的历史价值。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中西方文化的不断涌入和不时泛起的“自由化”思潮，党中央逐步调整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在以往突出传统文化“历史性”意义的基础上越来越重视其“民族性”意义，即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中华文化的根基、母体意义，对于中华民族认同、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意义。进入新世纪后，弘扬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重视。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如此定位，在党的历史上是首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并非意味着自大、封闭，而是与海纳百川的文化开放胸怀构成辩证的统一。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无论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讲，还是从统筹两个大局的现实角度看，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必须立足本末、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努力创作同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我们这个蓬勃发展的国家相匹配的优秀文化作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以“三新”经济为抓手 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 于凤雷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要“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举行的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论断，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深入推进技术和数据的创新应用，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应成为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的重要抓手。

“三新”经济是重要“稳定器”

在我国，经济中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生产活动的集合简称为“三新”经济，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近年来，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下，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蓬勃发展。适应多样化消费需求、促进形成高品质供给，日益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源。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2020年，我国“三新”经济占GDP比重从15.7%提高到17.08%。尤其是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和严峻复杂国际形势的影响，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却比上年增长4.5%，比同期GDP现价增速高1.5个百分点。平台经济、网上零售等持续活跃，明显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高新技术产品生产持续较快，2021年5月，智能手表、工业

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分别增长87.5%、50.1%、49.2%、43.3%。“三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既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

“三新”经济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新经济是数字技术和传统产业深度融合的产物，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更进一步增加了融合的速度和深度。一大批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快速涌现，正在日益深刻地改进着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配置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社会整体福利。“三新”经济的发展壮大正在加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三新”经济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7423亿元，同比增长11%，占比4.39%；第二产业增加值为73487亿元，同比增长4.3%，占比43.42%；第三产业增加值为88345亿元，同比增长4.2%，占比52.2%。技术的迭代更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源，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不断演进升级，与传统行业的技术的融合深度广度不断加深，赋能作用持续加强，创造的应用场景日益丰富。未来数字经济发展更大的需求来自于制造业和农业等实体经济领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将呈现加速态势。

“三新”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除了经济总量扩大导致基数提高外，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传统经济增长乏力也是原因之

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三新”经济为主体的新动能蓬勃发展，对于“稳增长”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2020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上年的增速从19.6%提高到35.3%。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逐年攀升，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加速发展壮大，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新经济成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两手抓”促进“三新”健康持续发展

尽管“三新”经济增加值在我国GDP中的占比不断提升，但相对经济总量而言还是偏低。面向未来看，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需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大相关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为“三新”经济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让市场主体更加活跃；另一方面，需要坚持促进发展和规范发展“两手抓”，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引导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为“三新”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一方面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放开市场准入，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和引导更多的市场主体进入“三新”经济领域。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大力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进一步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对新经济发展

的作用。通过完善政策法规，鼓励、引导和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及时修改与“三新”经济不相适应的旧规则，综合运用财政、税收等工具为“三新”经济赋能。另一方面，要以数字政府建设为引领完善面向企业的公共服务。以推动数据共享为抓手，以改革创新打通“数据底座”，增强数字政府效能，更好满足企业和公众对政务服务越来越高的需求。此外，还需要在政策和制度上为“三新”经济发展留下适当空间，鼓励企业和社会积极尝试，对“试错”采取包容审慎的态度。

坚持规范与发展“两手都要硬”。“三新”经济同样是法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防范技术应用和模式创新带来的风险和问题。一方面要坚持“底线监管”。对于发展中出现的损害群众利益、妨碍公平竞争、侵犯平台从业人员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和做法，要坚决予以纠正和规范。要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依法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另一方面，要在推动新经济发展的同时重构建管体系。进一步突出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平竞争监管制度，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适应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新特点，持续完善和优化现有监管制度，根据实践需要适时制定新监管制度。此外，发展“三新”经济在注重效率的同时要兼顾公平，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共同富裕。